



经典重温之电视剧《闯关东》表现民族精神是国剧的良心和担当

□范咏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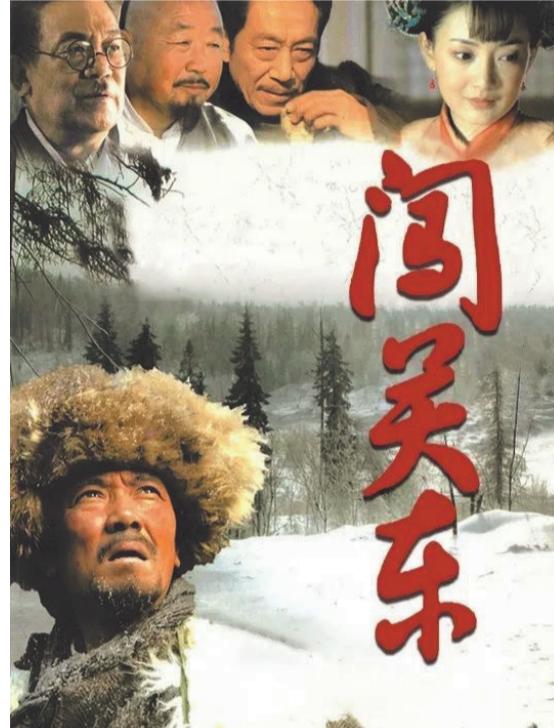
中国抗战题材影视作品若想成为经典,需要以严肃的态度、理性的创作、客观的叙述、多元的视角、丰富的影视语汇,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美学的平衡中构建叙事。只有在历史与美学的双重框架下“讲史”,才能真正实现“扫雷”与“去神”的效果

52集长篇电视连续剧《闯关东》自2008年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作为开年大剧播出后,首轮全国平均收视率便接近11%,并创下连续四周北京地区收视冠军的纪录。该剧由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大连电视台联合制作,张新建任总导演,孔笙、王滨执导,高满堂、孙建业编剧,李幼斌、萨日娜、宋佳、牛莉、马恩然、王奎荣、高明领衔主演。该剧获得多项国家级大奖,在中国电视剧史上无疑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力作。

17年之后的今天,《闯关东》的经典地位依旧稳固。它“大”——题材大,故事体量大;它“新”——史诗与传奇融合为共生态叙事,释放出强烈的民族精神题旨;它“奇”——故事大开大合,人物命运跌宕起伏,关东风情民俗独特。这一成就的取得,有赖于主创团队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对电视剧叙事规律的深刻认知。

今天我们所谓的文艺经典,是指能广泛地构筑于社会历史,在较长时期传承于社会,有足够的空间影响、孵化民族精神的作品。在中国近代史上,“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华民族三次大迁徙。其中闯关东经历时间最长,人数最多,且以山东人为最多。闯关东是一部表现中国移民的宏大奋斗史、拼搏史。几千万人历尽磨难,离乡背井,将辛勤的泪水和辛酸的故事留在了白山黑水。无疑,闯关东本身便是一座史诗级题材富矿。电视剧《闯关东》挑战了这一题材。为达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高度统一,剧作在对历史脉络做出纵向呈现的同时,对故事、人物做横向拓展,努力开掘题材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将剧作打造成了民族精神的“纪念坊”。

在以史诗剧的方式表现与解读民族精神的主题上,《闯关东》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民族精神意味着一个民族在适应环境、改造世界中,形成自己特有的语言习俗、人文传统,以及在长期发展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德和坚定志向,是为民族大部分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德与道德规范。民族精神发挥着对内动员和聚集民族力量,对外展示和树立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闯关东》主人公朱开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最本色的山东人,是闯关东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曾是义和团的一个好汉,身上深植着民族大义。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山东连年大旱,民不聊生。朱开山带领全家走上了茫茫闯关东之路。奔着关东“有自然之三大利:曰荒,曰矿,曰盐”,他们来到关东种地、采矿、放排、挖参、伐木、淘金,终于找到了自己新的生存空间。朱开山身上那种吃苦耐劳、见义勇为、讲信修睦、以义割恩的精神使他能够在东北应付各种生存危机,能够与当地的东北人共同生



存。剧作展示了一个普通山东家庭在广袤、荒凉的山水间,在悲怆、苍凉的命运中倔强扎根、生息繁衍,最终成为一个坚韧大家族的经历,透射出闯关东的顽强精神。甚至,朱家能够娶到那文格格这样的儿媳妇,都和朱家的名声分不开。文他娘坚强、贤惠,深明大义:千里寻夫,收养日本孩子,善待鲜儿、秀儿,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闯关东》开掘民族精神的基石。这些传统美德超越政治、历史的意识形态,具有不可解构、不可颠覆性。朱家特别看重“家”。传武临终时要求回“家”,表现出对家的眷恋;朱家曾经开除过传文的“家”籍,传文悔过以后请求让他回“家”……他们如此依恋“家”,是因为朱开山、文他娘让他们懂得了应该怎样去做中国人。剧中的“家文化”同样是对民族精神的诠释。

《闯关东》在充分遵循史实与时间线的前提下,

将故事的连贯性与戏剧性平衡得恰到好处,将人物命运与时代背景结合得紧密合理。朱开山这条早年反抗八国联军侵华的山东汉子,闯关东后运金成功,在元宝镇站住了脚跟,此时的背景是辛亥革命成功;元宝镇遭到散兵烧杀抢掠,朱家被迫北上齐齐哈尔,开煤矿与日本人发生利益冲突,此时背景是日本人侵占东北的野心渐显。《闯关东》这两个重要的情节转折点,使其故事由家族叙事上升为家国同构叙事,人物完成了从传统美德到民族精神的升华。《闯关东》让观众耳目一新之处在于,这群中国人形象,不

仅实诚而且智慧、包容,就像朱开山刚到齐齐哈尔开办山东餐馆和货栈遇到恶性竞争所表现的那样。表现民族精神是国剧的良心和担当所在。历史大戏,家族大戏,人生大戏,它们的灵魂在于能否诠释民族精神,这也是能否创作出史诗的起码要求。如黑格尔在论史诗时所言:“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史诗这种纪念坊简直就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意识基础。”

二

《闯关东》原拟创作“三部曲”,第一部时间截止到九一八事变。所以其主要篇幅并不是反映抗日斗争。但剧作通过充分的铺垫,在大结局中把抗日斗争推向高潮。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朱家人不再只是关心自己的生意、煤矿,他们把维护民族尊严放在了首位。结局这样一组画面,朱传武牺牲后,朱开山说:“把传武抬楼上去!”面对牺牲者,不论是文他娘扶着儿子痛哭,鲜儿和他未了的夫妻情以及秀儿的夫妻情,还是朱开山独自垂泪的镜头,都震撼人心、催人泪下。危局中,朱开山依然教育全家说:“我们中国人得好好活着。”一家人上阵杀了日本侵略者后,用马车拉着全家又踏上了茫茫的迁徙之路。此时尽管文他娘已是白发老太,但他们的又一个孙子诞生了,不仅有了一个大名“国强”,还有一个小名“亮子”,顿时就把历史和今天观众对接了起来:深信民族要自立,国家亡不了,任谁也不能无视中国和中国人!

《闯关东》之后的《闯关东中篇》是又一部极具思想震撼力和史诗品格的力作,这部剧以抗战叙事为主体,由于它和《闯关东》的主要故事已经没有关联,尽管编剧仍为高满堂、孙建业,故不在本文详述之列,但它仍无愧于《闯关东》这个品牌。

《闯关东》给当下抗战剧的启示在于:主创团队首先要敬畏历史,尊重历史事实,正确还原历史语境。中国抗战题材影视作品若想成为经典,需要以严肃的态度、理性的创作、客观的叙述、多元的视角、丰富的影视语汇,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美学的平衡中构建叙事。只有在历史与美学的双重框架下“讲史”,才能真正实现“扫雷”与“去神”的效果。所有向着经典前行的剧作都应把功夫下在认真研究历史,正确还原历史语境上,体现对历史的高度尊重以及勿忘国耻、缅怀英烈的叙事主旨,使剧作真正发挥历史教科书的认知作用。正如《闯关东》所努力追求的,用客观、理性、均衡与自省的逻辑书写中华民族共赴国难、保家卫国的神圣战斗诗篇。在一种整合性的书写中,使剧作完成对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的承载。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

纪念冼星海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8月26日,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广东省文联共同主办的纪念冼星海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会上大家观看了纪念冼星海短片,回望了冼星海追求光明、献身艺术的一生,以及他炽热的爱国情怀和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大家表示,冼星海的一生,是用音乐为民族解放事业战斗的一生,也是用音乐践行爱国理想、为人民放声歌唱的一生。他将个人艺术生命融入民族命运,坚持并发

展了从聂耳开始的革命音乐传统,通过广泛的题材和体裁,创造出许多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四年代中国人民拯救民族危亡进行抗日斗争的生活。新时代音乐工作者要以冼星海为榜样,始终将个人艺术理想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从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中捕捉创作灵感,从人民群众的奋斗故事中提炼主题素材,用更多传递中国精神、凝聚民族力量的优秀作品,全方位展现新时代中国的精神气象。

以“舞蹈+短剧”探索敦煌文化新表达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视协网络视听艺术创作委员会和中国传媒大学视听艺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微短剧《舞动敦煌》影会在京举行。作为国内首部舞蹈微短剧,《舞动敦煌》由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央视频、总台甘肃总站、红果短剧、甘肃省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出品,以“舞蹈+短剧”的创新形式,讲述现代舞蹈学生陈曦与唐代舞姬昭慕云因敦煌壁画灵魂互换、共护《伎乐图》的故事。

该剧总制片人杨娜谈到,打造《舞动敦煌》是主流媒体探索“传统文化现代表达”的新尝试。团队沿用国内首部聚焦古籍保护的微短剧《重回永乐大典》原班人马,邀请导演李少红团队把控艺术细节,

在演员选择上兼顾“舞蹈功底”与“演技”。她坦言,创作中需在“主流价值观与市场短剧爽感”间寻找平衡,一些细节、情节设计都经反复打磨,力求既吸引年轻观众,又不脱离文化内核。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区别于纪录片“揭秘式”呈现,用微短剧形式契合年轻受众的观看习惯。在人物塑造方面,双女主陈曦与昭慕云形象鲜活,分别展现了舞蹈之美、敦煌之美、人性之美。剧中“画与舞”呈现共生关系——沈桓壁画、昭慕云擅舞,二者合作成就壁画完整复原过程,既还原了敦煌艺术“画舞同源”的历史渊源,又传递出“艺术传承需创作者与演绎者共同努力”的深层逻辑。

百灵琵琶和玫瑰都塔尔是传说中的两件乐器,喀什民间乐器制作大师卡德尔用一棵情侣树制作了这两件乐器。据说当两把琴一起弹奏时能发出天籁之音,如果两把琴共同属于两个相爱的人就能给他们带来幸福,如果两把琴分开则会给拥有者带来苦难。于是,百年之后卡德尔大师的子孙们为找到这两把离散多年的古琴,上演了一部发生在父子两辈人之间为合谋琴的故事。

电影《巴扎喜事》作为开幕影片亮相2025年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这部电影反映喀什古城民间传说与现代生活的影片,凭借独特的定位和灿烂的光影在国际舞台上绽放,让世界各国来宾和现场观众看到了一个真实、幸福的新疆。

共同生活的场景多姿多彩

喀什古城乐器制作传人克力木和饭馆老板亚力坤因两把琴怨恨多年,他们的矛盾在收藏家老赵开办民族乐器博物馆的过程中日益激化,也把两家儿女的爱情婚姻搅进“琴争”漩涡。在互联网时代,随着大众参与找琴,克力木的儿子艾尼和亚力坤的女儿莱丽在汉族大叔老赵的帮助下,以举办盛大音乐会为契机,真诚面对亲情、爱情的考验,将两把琴重归于合,使因琴争斗的两家人成为彼此包容理解、共享幸福的喀什人家。

影片聚焦城市生活内容,打破了观众对新疆“西域边关”“奇异风情”的刻板印象,其所表现的现代生活令人耳目一新。如今的喀什古城里,多民族市民熙熙攘攘,牛羊商贩熟练地用手机转账,咖啡馆里维吾尔族女老板古丽与来自香港的旅客如朋友般调侃,传统的“坎土曼”(锄头)巴扎变成了非遗博物馆。随着剧情的展开,观众能看到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多姿多彩、丰富立体与欢乐美好。

影片赋予不同角色充分表现的空间:世故但又深爱民族传统乐器的克力木、对婚姻充满恐惧却深爱家庭生活的亚力坤、老赵作为汉族的收藏家将保护少数民族乐器当作使命、莱丽作为导游利用网络推广喀什、艾尼在咖啡馆驻唱兼带旅拍……新疆方热土上,既有坚守传统的匠人,也有拥抱互联网的青年,既有保留完好的千年古城,也有蓬勃发展的文旅经济。该片让过往观众对新疆的猎奇想象转变为有力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为增强国家凝聚力贡献了电影力量。

场景。

在2025年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上,《巴扎喜事》荣获最佳音乐奖,音乐舞蹈在《巴扎喜事》中的运用实现了传统音律与现代节奏的创造性融合。艾尼创作的流行歌曲融入了十二木卡姆的音律,以新疆式摇滚风格实现了民族乐器热瓦普、都塔尔与现代乐器吉他、架子鼓的合奏。传统刀郎舞的鼓点与现代电子音乐的节拍呼应起伏,民族艺人的原生态演唱与青年乐队的流行表演交相辉映,丰富了中国电影的音乐表现力。

歌舞在影片中的运用对塑造人物、推动剧情发展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市民与游客共舞的场景体现了民族舞蹈的开放、灵动、热情,而莱丽在旅拍中裹着红纱与金色被巾的旋转镜头,用浪漫夸张的手法渲染了蔚蓝的湖水、红色的沙漠、洁白的雪山,主创借舞蹈展示山河美景,凸显出新疆山水的人文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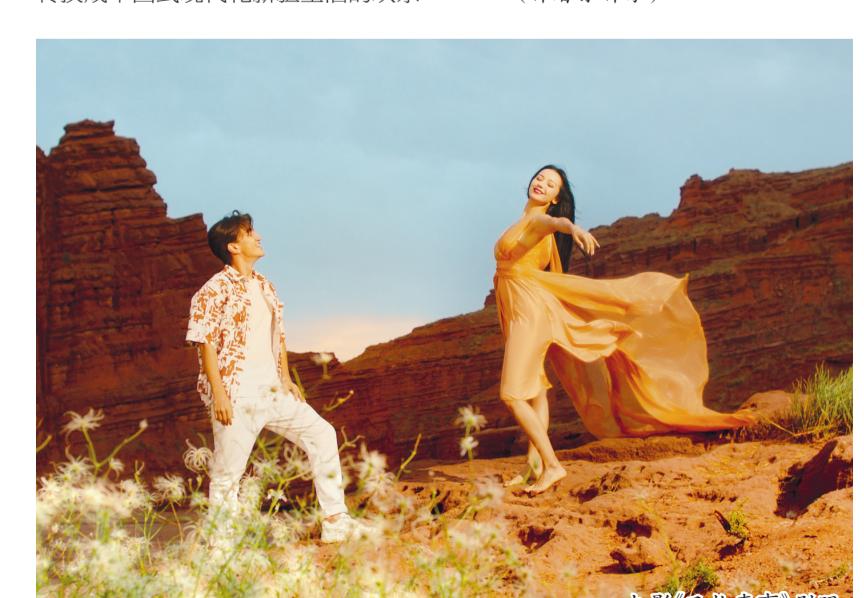
推开了一扇认识新疆的新视窗

《巴扎喜事》是天山电影制片厂为中国民族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的一次有益实践。该片运用电影科技的现代语言,将喀什古城的地域风情、文化元素、现代生活转化成极具影响力的文化资源,满足了不同层次的观众对新疆电影、新疆生活的新期待,有力推动了当地的文旅融合发展。

片中,喀什古城在夕阳下恢宏古朴的远景、泥黄色的高台民居建筑在逆光中铺展史诗般的轮廓、万家灯火中“丝路明珠塔”的夜景等,打破了观众对新疆电影的传统视觉记忆,为天山草原、大漠孤烟、雪峰森林的新疆印象推开了又一扇新视窗。此外,影片在剧情中融入“网红发布找琴消息”,新疆本土网红博主出镜表演,使电影与喀什的网红经济形成链条关系。电影上映后,这些网红博主又在社交媒体上推广电影,形成“电影带动网红经济,网红反哺电影传播”的良性循环。

过去民族题材电影往往是“叫好不叫座”,而电影《巴扎喜事》将民族题材大众化、边疆生活现代化,为中国民族电影市场的培育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系作家)



电影《巴扎喜事》剧照

新疆,你的光影如此灿烂

电影《巴扎喜事》

《左宗棠收复新疆》总撰稿、甘肃省文联党组书记王登渤谈到,创作团队始终秉持大历史观,坚持用真实的历史事实、生动的人物形象、丰富的艺术语言,通过左宗棠在维护领土主权上的坚定立场,同时也刻画了他作为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格维度,从而塑造出一个更加立体、真实的人物形象。该片总导演王新建认为,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团队在制作过程中深入考据、细抠历史细节,坚决避免将历史人物简单脸谱化。在表现手法上,该片采用剧情化叙事风格,但始终以史实为根基,做到有据可依、有史可循。

与会专家认为,爱国主义始终是文艺创作的主旋律,该片正是文艺工作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该片凭借严谨的学术态度与自觉的艺术追求,通过讲述左宗棠收复、平定新疆并推动建省的事迹,有力助推公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左宗棠所体现的深厚爱国精神,值得每一位中国人铭记与发扬。

(许 堂)